

红色文化

新四军军歌中的闽北子弟兵

□江礼良

“光荣北伐，武昌城下，血染着我们的姓名……”这首由陈毅原词、何士德作曲的嘹亮军歌《新四军军歌》，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下，传扬着血与火熔铸的新四军军魂。新四军中有一支劲旅由闽北子弟兵组成，循着歌声的旋律，我们可以追溯这支革命铁军的战斗足迹，缅怀先辈的殊勋。

“千百次抗争，风雪饥寒；千万里转战，穷山野营”。这是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的前身——闽北红军游击队战斗生活的生动写照。闽北全域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发挥着中央苏区东北大门的重要作用。1934年10月，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，敌人调动1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闽北苏区进攻，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被迫转入武夷山腹地。此时，闽北红军2000余人在黄道、曾镜冰等指挥下，将部队化整为零，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。红军整编为闽北独立师，师长黄立贵，下辖4个团，采取“分散活动，集中打击”战术，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，孤军奋战在武夷山脉，与湖南罗霄山上的铁军精神一脉相承。

“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”，闽北红军游击队不仅没有被困死、被剿灭，反而在战斗中获得经验、锻炼精神，不断发展壮大。至1936年底，游击区扩展至闽浙赣三省26县，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。这期间，黄立贵率部在洞宫山与闽东独立师会师，黄道与叶飞在此举行闽北、闽东党委联席会议，成立了中共闽浙赣省委。1935年3月，粟裕率领军挺进师进驻闽北地区，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。

“为了社会幸福，为了民族生存。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，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”。大敌当前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。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，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37年10月，国共两党达成协议，将湘、赣、闽、粤、浙、鄂、豫、皖八省边界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（简称新四军）。一贯坚持斗争的闽北红军游击队，以民族大义为重，加入了这支由八省健儿汇成的抗日铁流。中共闽浙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光泽县境内举行了谈判，谈判地点选择在光泽县司前乡北部靠近江西铅山的大洲村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大洲谈判”。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，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，在崇安（今武夷山市）长涧源集中后，开赴江西铅山石塘镇整编训练。1938年1月，闽北红军游击队在江西石塘集中整训，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，饶守坤任团长，曾昭铭任副团长（政委），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，全团1500多人，“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”，抗日铁军威震四方。

“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，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”。这支队伍保持和发扬了中央苏区红军骁勇善战、不屈不挠的光荣传统，以“听觉指挥”为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。三支队五团到达徽州岩寺时，接受了军领导检阅，叶挺军长高度评价：“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，是很强的骨干力量……”新四军共有10个团，其中福建4个团，三支队五团就是其中之一，是福建子弟兵在新四军中最重要建制单位之一。

“血染着我们的姓名”，新四军中的闽北子弟兵，无愧于这英勇而悲壮的歌词。这支队伍不怕牺牲，浴血奋战，连续开展了对日作战的“红杨树战役”，对日作战的“五次繁昌保卫战”，以及“血战东流山”。1941年1月，在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中，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，三支队五团被安排保卫军部，血战东流山，英勇奋战七昼夜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大部壮烈牺牲。

“血染着我们的姓名”，还见证于新四军闽北斗争历史的另一座丰碑，即著名的“赤石暴动”。1942年6月17日，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在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，被押解至崇安县（今武夷山市）崇阳溪赤石渡口时，80多名同志按计划向四周田野和山林分散突围，有40余名同志成功逃脱，历经艰险后重返抗日前线。这次英勇的抗争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“东进！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”——铁的信念、铁的意志、铁的团结、铁的纪律、铁的作风，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。愿后人永续传承“铁军”之魂，让这首用热血与信仰谱写的军歌，在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上永远嘹亮。现今，南平市城内与新四军相关的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数量可观、类型丰富，主要有：大洲谈判旧址、崇安长涧源集中地、新四军南平留守处遗址、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、赤石暴动烈士陵园、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等，都是这支前进的铁军留下的历史足迹。

军歌，远非简单的节奏与旋律，不是一般的音乐，它是英雄史诗的见证，红色基因的赓续，是艺术形式的历史文献。今天，我们能够从《新四军军歌》中追寻、缅怀闽北子弟兵的光荣历史，也足以说明闽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南平市新四军历史资源，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突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，形成了从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到迎接全国解放的完整革命链条，闽北无愧于“红旗不倒”的光荣称号。

延平区明洋村：

藏于大山深处的红色记忆

□王丽娜 文/摄



越来越多的人参观李氏祠堂，了解明洋村的红色历史。

初夏时节，笔者踩着晨雾，来到延平区南山镇明洋村。这座藏在延平、古田、建瓯三地交界的小山村，深藏着厚重的红色革命记忆，镌刻着闽北老区不屈的奋斗过往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明洋村地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边缘，红色火种在此扎根蔓延，当地群众踊跃支援革命，掩护地下交通、配合游击斗争。一代代明洋儿女投身革命洪流，用坚守与担当书写了老区人民的赤诚与勇毅。这次到访，笔者没有刻意寻找宏大的精神标签，只是想坐在老村民身边，听听那些没写进教科书里的、带着烟火气的往事，触摸最真实的老区记忆。

在杜嵩岭的红豆杉树下，笔者见到了70多岁的李孟绪老人。老人坐在树下休息，伸手轻轻摩挲着老树的纹路，手掌粗糙，满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聊起从前，老人语气平淡，却字字真切：“以前日子太难了，那辈人，都是硬生生熬过来的。”

老人的父亲曾是村里地下支部委员，从小到大，他听着身边的革命故事长大。没有书本上的文字描述，只有父辈深夜的闲谈、乡里长辈的口述，这些往事慢慢扎根在心里，一辈子都忘不掉。“明洋村当年有人参加了红军，这里面有李盛有和施万响。”说起这两个名字，老人的眼神变得庄重，“那时候中共闽浙赣省委在村里待了九个月，想动员大伙参加革命。”

老人的回忆里，满是当年的苦难与挣扎。杜嵩岭山高路险，旧时匪患横行，百姓深受其害。说到这里，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：“记得当时，土匪杀害了好多百姓。”

也正因为这样，革命的火种一传到明洋村，就立刻烧了起来。村民们太盼着光明了，太想有个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、不受欺负的新世界，所以只要红军需要，没人退缩。

明洋村的山和水，都记着红军和村民并肩的日子。这里群峰环绕，林子密得很，地势险要，当年就是天然的藏身之处和堡垒。1934年，闽北红军58团和迪口游击队就在这一带活动，给村民们讲革命道理，播下希望的种子。施万响、李盛有等明洋儿女毅然加入红军，跟着队伍踏上革命征程。他们中，有的再也没有回来，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革命路上；有的坚守在闽北游击战场，用热血守护着这片故土。

沿着村中的古道前行，鹅卵石铺就的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，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红军战士的脚步声。古道旁的古埡峭口，地势险要，视野开阔，曾是村民们为红军站岗放哨的重要据点。“那时候，关口放着两杆土铳，还有‘独草鞭’，山顶上备着插木、竹

尾枪，只要派人把守，就是‘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’。”老人指着峭口的遗迹，语气里藏不住自豪，“1948年，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迁到这儿，这里就成了指挥全省游击战争的中心。晚上，贫农团的八位同志轮流放哨，点着香计时，一柱香烧完就换岗；白天，儿童团的孩子们守在这儿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身影。”

杜嵩岭上的李氏祠堂，是这段历史最实在的见证。这座建于晚清光绪十八年的老祠堂，1948年4月，曾召开过一场关乎福建解放的会议——中共闽浙赣省委“扩党练干”会议。当时省委书记曾镜冰主持会议，左丰美、苏华等一百多位同志都来了，会上通过的决议，为后来福建的解放打下了基础。

如今，祠堂改成了革命历史展览馆，里面的旧照片、老物件，都是实打实的记忆。“苏华同志是个女英雄啊，她建了‘地下航线’，给革命送物资、传情报，不容易。”李孟绪老人指着墙上苏华的照片，语气里满是崇敬，“在她影响下，我们村的施妹婢、朱吓妹几个妇女也加入了革命，被敌人抓去后，也没吐露一个字的秘密。”

展馆的墙上，密密麻麻写着明洋村参加革命的人的名字，施万响、李盛有、董家树、邱维成……一共200多个。笔者算了算，当年村里也就200多户、600来人，差不多每户都有一个人加入了贫农团或游击队。其中上明洋的地下党员邱维成，被捕后遭了不少罪，最终牺牲在狱中，用生命守住了对革命的承诺。

“游击队走后，国民党把村子烧得一干二净，我们只能逃荒。笋厂、纸厂没了，2000多亩山林被烧，藏在山洞里的稻种也被抢光了。”老人叹了口气，却又立刻挺直了腰，“可就算这样，我们也没服软。和红军一道，多大的苦都能扛。”

九十年过去了，革命的硝烟早就散了，但那些精神，就像村西边的红豆杉，扎在这片土地里，长得枝繁叶茂。六棵树龄370多年的红豆杉，站在村口，像守村的老人。村里的老人说，清末民初鼠疫横行时，红豆杉树冠上曾

飘着青烟，没多久疫情就散了，从那以后，村民们就把这些树当成村神树，代代守护。在笔者看来，它们更像明洋人的性子，坚韧、顽强，不管经多少风雨，都能稳稳地站着。

如今的明洋村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苦难的小山村了。走在村里，干净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，新房错落有致，到处都是生机。“2014年的时候，有领导来调研，站在观景台上说这儿风景好，我们听了都受鼓舞，就自发组织起来清理村子，整治环境。”李孟绪老人笑着说，“一开始就想着，我们村有这么多红色故事，不如走红色旅游路。没想到真有不少福州游客慕名而来。”

通往杜嵩岭的路，确实美，沿途全是葱郁的阔叶林，风吹过来，树叶沙沙响，既有山野的清幽，又藏着红色的记忆。只是一开始，村里没什么食宿的地方，游客来了，只能匆匆看一眼就走，挺可惜的。

“后来大伙就合计着，自己动手干。村民们投工投劳，义务出力，还自发集资建了休憩凉亭，又琢磨着建山庄、游客接待中心。”说起这些，老人的脸上满是骄傲，眼里闪着光。政府也帮了不少忙，拓宽公路、完善基础设施，明洋村红色美丽乡村提升项目落了地，上级资金争取到了，宗祠修好了，红色雕塑也立起来了。干部和村民一起使劲，村子一天比一天好，红色旅游也慢慢做起来了。

平坦宽阔的水泥硬化公路直通村口。现在从福州来明洋村，也就一个半小时车程。景阳山上，复原的哨所、练兵场、电台旧址，成了游客们爱去的地方。站在观景台上，能看见连绵的群山，清晨看日出，雨后看云海，像走进了诗里。村民们借着这“红色”和“绿色”的资源，把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结合起来，村里的桃子、有机蔬菜，游客们都爱买，昔日的革命老区，如今也成了避暑康养的好地方。

村民赵显龙和笔者聊起他的叔叔赵福生，语气里满是敬佩。“我叔叔1947年参加游击队，那时候他年纪小，大家都叫他‘小鬼’。”赵显龙说，“当年游击队领导动员大家，说革命成功了，乡亲们都能过上暖和的卫生衣，家家都有自己的田种。就为了这句话，我叔叔跟着队伍出生入死，再苦再累也没抱怨过。”如今，赵福生老人已经退伍，看着村里的好日子，他总说：“当年我们盼的，现在都实现了，没辜负那些牺牲的战友。”

站在景阳山的练兵场上，风穿过松林，松涛阵阵，不像号角，更像先辈们在和我们说话。这里的马尾松，长在贫瘠的山坡上，却依然挺拔，村民们都叫它们“迎客松”。它们就像明洋人，像所有福建儿女，靠着一股韧劲，在风雨里一步步往前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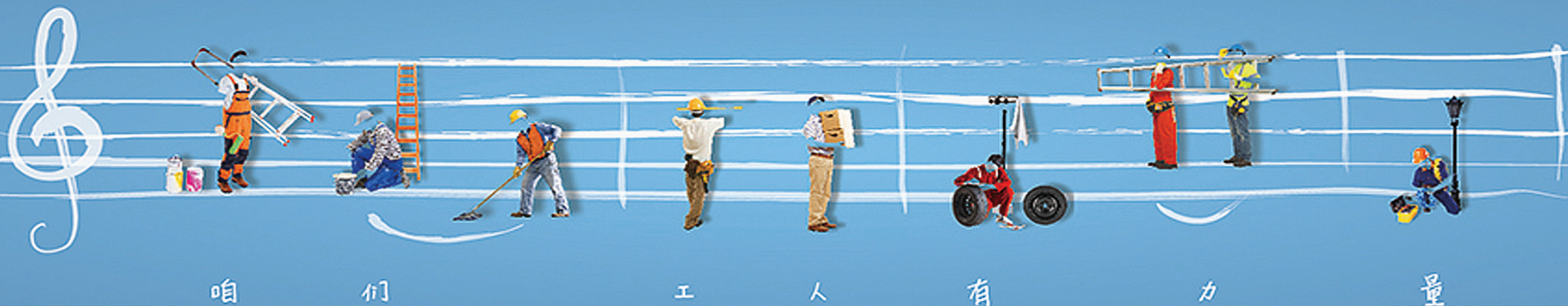
来明洋村走一走，笔者才真正明白，那些先辈的故事，不只是刻在墙上的文字，还是李孟绪老人眼里的湿意，是赵福生老人的知足，是明洋村家家户户的好日子。

革命精神从来没有远去，它藏在明洋村的红豆杉里，藏在村民们的实干里，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。我们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续写当年的长征路。愿这松风永续，愿这红色的火种，在八闽大地上，一代代传下去。



位于明洋村的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电台遗址

用团结协作 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咱们工人有力量